



西藏：一面国旗与三代人的守望

(上接1版)1963年,解放军撤离西日卡村,但“唱国歌、升国旗”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。

西日卡村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,大风天气多、雨雪频繁,国旗一两个月就会磨损。在物质贫乏年代,村里干部群众往往徒步近百里,买来红布、黄绸,捻羊毛线,缝制国旗。

“我们热爱国旗,敬仰国旗。”62岁的索朗帕加入党42年,对国旗有特殊的感情。他说:“无论是村里集体劳动,还是边境巡逻,每当我看到国旗飘扬,我们心中总是激情满怀。”

西日卡村位于林芝市朗县金东乡,地处边境,家家升国旗,户户珍藏着换下的旧国旗。“现在生活变好了,换国旗的频次也增加了,老百姓希望国旗一直保持鲜艳的状态。”现任民兵队长旦增尼玛家,仅近两年换下的国旗就有40多面。

一次次升起的国旗,寄托着边陲百姓的家国情怀。

2017年10月28日,习近平总书记给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、央宗姐妹回信的消息传到西日卡,80多位村民自发用藏语、汉语在“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、幸福家园的建设者”的横幅上签下名字或按下手印,用最纯朴的方式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和守卫国土的信心。

三代人的国旗情

每逢西日卡村升旗仪式,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加措总是提早到来,并庄重地站在最前排。凝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,这位49岁的藏族汉子总是不由地想起他的外公扎西。

扎西是西日卡庄园第一个认识解放军的农奴,那时人们习惯称他“康巴扎西”。20世纪40年代,由于不堪残酷压迫,他携妻从藏东康区流浪到西日卡,沦为“朗生”(农奴)。

1959年3月,解放军到西日卡平息叛乱,不愿看到民主改革的农奴主散播谣言“红汉人来吃人了”,32名不明真相的农奴逃走。正在田间劳动的扎西,遇到追捕叛匪的解放军。当时,担任解放军翻译的布迪也是一名康巴(藏东)人,扎西通过这位老乡获知解放军是帮助穷苦人的部队,了解到西藏的形势和未来,勇敢地与解放军站在一起了。

扎西随同解放军行走两天两夜,劝说被蒙骗的群众,但他的话令很多人难以置信。扎西毅然咬破手指发誓:“我用天和地发誓,共产党特别好,一定要相信他们。”

平叛结束,解放军撤离西日卡,临走时特意送给他扎西一匹白马。受尽苦难的西日卡农奴送解放军,期待着民主改革的早日到来。

1960年3月,西日卡村全面实行民主改革。扎西一家分得了11亩耕地、6头牛、5只羊和两间房屋,他当选为西日卡村农民协会委员。从此,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,巡逻边境,被大家尊称为“委员扎西”,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者和参与者。

“父亲特别喜欢升国旗的场面。解放军撤离前,将一面手缝国旗交给他,嘱咐他要把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延续下去。”扎西的女儿、



▲林芝市西日卡村村民代表在村委会小广场举行升国旗、唱国歌仪式(3月20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

今年72岁的白玛拉姆说。

扎西在1962年边境冲突中支援前线时眼部受伤,晚年失明,但他总要家人搀扶着坚持参加升旗仪式,他说:“听到国旗在风中飘扬的声音,我就心潮澎湃!”1997年,扎西临终前还再三嘱咐白玛拉姆和她的丈夫益西加措:“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,你们要坚持升旗,热爱祖国!”

在扎西老人的感召下,白玛拉姆和益西加措坚持升国旗,益西加措幼时从藏东昌都左贡县乞讨到西日卡村,民主改革后成了一名护路工人,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作为红旗下成长的第一代人,有了文化的益西加措,时常给儿子加措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以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故事,家中还收藏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。

在白玛拉姆200多平方米的新房里,加措抱来一个木匣,捧出一面国旗。这是一家人在20世纪80年代手工缝制的,长度大约有2米,宽度约1.5米,边角残缺。红色布底缝有黄色布料的五角星,线头有些凌乱,但清晰可见。

由于年代久远,扎西的日记本、手缝国旗以及当年与解放军往来的书信未能保存下来。然而,一家三代的国旗情缘仍在延续。加措时常教育儿女:“我们一家人现在的幸福生活,是先辈们跟着共产党走、在祖

国大家庭中才有的。”

新房里,炉火烧得正旺,加措正在观摩儿子次旺旦买的可手摇升挂国旗。窗外,农家屋顶升起的国旗在风中飘扬,加措说:“我们地处边疆,一定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。”

国旗下的小康路

环抱着雪山中的西日卡村,掩映在青山绿水间,宽敞的水泥路通向农家。昔日闻名藏东的西日卡庄园,如今残破不堪,没了往日气派,“淹没”在错落有致的新房中。

新房的主人,正是民主改革前的农奴及他们的后代。这样的变化,得益于国家在西藏推行的边境小康村建设。建房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承担,村民只需自备石头和木料等。

边境小康村建设让西日卡村换了“新颜”:民房改造率、通水通电率、广播电视覆盖率、移动网络覆盖率均达100%,村排水系统基本完善,路灯基本覆盖全村,村级卫生室、幼儿园也已建成投用。

69岁的其加,2016年搬进新房。女儿次仁在村里开了一家电子商务综合超市,她的丈夫外出打工,2019年家庭收入超过10万元。

地处偏远、土地贫瘠的西日卡村风光旖旎,草场宽阔,牧业旅游业发展具有优势。村里去年投资50万元引进42头良种

牦牛和25头良种犏牛,组建起集体养殖合作社;同时启动生态旅游项目,以乡村经济转型升级,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。

国旗飘飘,党旗猎猎。在决战脱贫攻坚中,西日卡村发挥传承多年的优良传统,持续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,动员48名党员结对帮扶贫困群众,以强有力组织优势,巩固脱贫成果,推进乡村振兴。

26岁的罗布扎西,2015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,和姐夫合资购买了一台二手挖掘机,借着219国道修建和边境小康村建设等项目,年收入超过30万元。去年,他成为一名预备党员,带领12户贫困群众增收近20万元,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。

得益于自身发展能力的增强,以及国家的草场、林地、边民等多种补贴,2017年西日卡村2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,全村实现整体脱贫。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近19000元,高于全区平均水

“现在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这么好,唯一可惜的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,享受不了几年好日子了。”采访中,仁增和白玛拉姆笑着对记者说。

3月底的林芝,杨柳吐绿,桃花盛开。坐在车上回望西日卡,这座藏在深山里的边陲小山村,国旗飘扬,在阳光照射下,如诗如画。(参与记者侯捷、张汝锋、旦增尼玛曲珠)

▶左图:扎西双手拿着旧西藏时自己使用过的镰刀;右图:扎西在自己家中(拼版照片,3月12日摄)。

今年83岁的扎西老人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——山南市克松社区居民,也是当地年纪最大的翻身农奴之一。他说:“旧西藏时,双手长在自己的身上,却被农奴主支配,成为他们的工具。”

西藏民主改革前,占人口不足5%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全部土地、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,而占人口95%的农奴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,无法支配自己的双手,去冲破枷锁,改变命运。1959年3月,民主改革席卷高原大地,彻底结束了残酷的封建农奴制,百万农奴翻身解放,获得新生。他们第一次用完全属于自己的双手,牵起自家的牛马,犁开自己的田地,播下希望的种子。那双曾被束缚、被桎梏、被奴役、被支配的手,变成民族团结的手、自由选举的手、勤劳致富的手、安居乐业的手、守护健康的手、学习知识的手,不断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从此,高原大地万象更新。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



坚守与新生:西藏农奴制社会经历者说

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(记者刘洪明)窗外微风习习,阳光透过玻璃撒满二楼阳台。90岁的边巴仓决老人,每天早上吃过糌粑后都坐在沙发上晒太阳,她看着满屋子的鲜花盛开。她29岁那年经历了人生巨变。

1959年3月28日,西藏民主改革,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,人民由此翻身解放,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。

61年来,社会制度的变更给百万农奴带来了人生蜕变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他们的生活日新月异。

同样吃糌粑,分量和心情截然不同

3月,坐落在半山腰的日喀则市白朗县旺丹乡桑巴村生机勃勃,农牧民忙着翻耕农田,羊群从路边跑过,春天的气息十足。

喝着酥油茶,66岁的白玛老人抱着重外孙哄他入睡,孙子孙女正在看书学习。看着他们,白玛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。

“父母都是恰鲁庄园的农奴,养了5个孩子,两人一天只能挣两勺子糌粑。”白玛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木质糌粑勺,这样的勺子是西藏老百姓从古至今盛糌粑的器具。

如今,桑巴村建立了编织卡垫和氆氇的合作社,这是白玛的女儿卓嘎发展起来的。47岁的卓嘎闯荡打拼多年,生意日渐红火。

2007年,卓嘎带着村里2个人去日喀则市区租了一间门店,手工编织、销售卡垫,销路还不错。卓嘎说:“积累了一些经营经验,2015年就回到村里和两位老同事一起干,一来能照顾老人和孩子,二来能给村民们找点挣钱的手艺。”

2019年,政府提供了30万元扶持资金,这对卓嘎来说可谓锦上添花,她们把这笔钱作为村集体投资入股,成立合作社,每年给村民分红。“现在有65人在合作社打工,其中32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,平均年收入3万多元。”卓嘎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、婚嫁、流动、居住、劳动等权利的制度枷锁,百万农奴实现了真正的人身解放。

同样的豆蔻年华,住房和教育天壤之别

“小时候全家7口人住着15平方米大小的黑房子,睡在地上,没有被子,只能盖破烂的羊皮。”白玛扯着自己的藏装说,“现在我和老伴每年都有新衣服穿,孩子们都穿棉衣。”

90岁的边巴仓决在旧西藏曾经历过

举步维艰的生活。“奶奶经常给我们讲过去的艰苦日子,教育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

活。”边巴仓决的孙子南木加说,“她常讲‘就算有100粒青稞也见不到白色,磨不出多少糌粑’。”

几孙满堂,已是四世同堂的边巴仓决无忧无虑。“我拿了好几年的寿星老人健康补贴,今年我90岁了,每年能拿到500元补贴。”她说,“现在政府对老年人的福利太好了,我要享福多活几年。”

“以前,全家一直跟牛羊混住,没想到现在老了还能住上两层楼房。”边巴仓决说,2012年政府安居工程使她住上了新房,“吃饭的时候再也闻不到牛粪的臭味了。”

边巴仓决想起她的姐姐,在13岁时,她的姐姐身上和脸上长满麻疹痘疮难耐,只能用绳子绑起来,最后还是在痛苦中死去。而边巴仓决自2009年因腹泻住院后,最近几年都没生过病。

除了医疗条件大幅改善,教育环境也在发生变化,时代在发展,教育环境也一天比一天好。边巴仓决告诉记者,在上世纪80年代,他最小的儿子去天津读内地西藏班,大学毕业后成为日喀则一名人民警察,过上了城市生活。

正午时分,阳光明媚,室内芳香四溢,边巴仓决老人脸上的笑容十分慈祥。

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(记者沈虹、罗布次仁、薛文献、王泽昊)“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”——山南市克松村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话剧:两代村民自编自演,讲述克松庄园农奴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遭遇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。这部民间话剧叫《农奴泪》。在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”前夕,记者再访克松村,倾听这部热演了半个世纪的话剧背后的故事。

“观众上台打‘管家’,演员只好躲起来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,山南乃东县郭莎村人头攒动,村民们正在观赏克松村演出队表演的话剧《赤列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悲惨故事》。

低沉的音乐,衣衫褴褛的农奴,颐指气使的管家……无限现实的场景把人们带到不堪回首的旧西藏——管家命令赤列多吉看守麦场,为防偷粮,在粮堆上做了记号。第二天,记号被乌鸦抹掉,管家不分青红皂白,抡起皮鞭抽打赤列多吉。

这时,观众中有人抽泣,有人谩骂,有人扔石头,有人甚至跳上戏台,要揍“管家”。演出被迫中断。今年70岁的多吉曾饰演赤列多吉的大儿子达瓦,对这一幕记忆犹新:“那时很多群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,受过苦,感触深,看剧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。”

在旧西藏,克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·旺钦格勒的庄园,农奴被当成“会说话的牛马”,有支不完的差,挨不完的打,吃不上一顿饱饭,受尽欺压。

有一次,赤列多吉饥饿难耐,与狗抢食,被管家毒打。他奋起抗争,结果遭受酷刑,惨死在监狱。妻子嘎多精神失常,消失在茫茫黑夜中。达瓦和弟弟萨波伺机报仇,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。留下萨波年幼的女儿拉甲艰难度日……

“小时候听母亲讲,真实的赤列多吉死了以后,被抛尸荒野。”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多吉心明眼亮,“他们一家的遭遇,就是广大农奴非人生活的缩影。”

民主改革后,克松村翻身农奴组成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筹委会,做了自己的主人。1968年,村演出队根据70岁的次仁老人的讲述,编排了这部话剧。

“当时条件很简陋,演员只有14个人,乐器也只有5件。”多吉说,“但大家很投入、很积极,都是义务演出。”年过花甲的达娃和次仁拉姆饰演女佣和拉甲,谈起当年,两人仿佛重回少女时代,谈到激动处,即兴演唱了一段:“天上的飞禽中鸟儿最弱小,世间的生灵中农奴最悲惨……”

这部话剧从1968年一直演到1975年。每年到农闲,演出队赶着装有道具的马车,徒步深入各县乡村、厂矿、学校演出,累计演出200多场,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,深受欢迎。“帘子掀开,音乐响起,就让人恐惧和悲伤。”55岁的边巴次仁一直记着小时候观剧的情景。

“我们是真的用鞭子抽,不用力就不像”

2009年3月28日,在西藏自治区设立的第一个“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”,新版话剧《农奴泪》首次上演,主题依然是“赤列多吉的悲惨命运”,但演员几乎都是年轻的新人。演出继续受到热捧,观众为农奴的悲惨境遇痛心疾首,也为管家的残忍凶恶捶胸顿足。

看到剧中管家用皮鞭抽打赤列多吉的孩子时,花甲之年的克松村居民白玛云旦泪流纵横:“农奴规定,农奴的孩子满8岁就要牧马放羊、支差役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2008年,拉萨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,引发了克松村老人们的深刻反思。为了教育后人,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牵头,请来曾参演话剧的6位老人,回忆整理剧本,将老版话剧改编为《农奴泪》。

新一代演员没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,不知道怎么演。“大家都说农奴苦,但怎么个苦法,我表现不出来。”饰演赤列多吉的白玛扎西说。

白天,他走村串户体验生活,请老人们手把手示范,认真排练,晚上加班背台词。随着对角色的了解,他逐渐走进了赤列多吉的内心。

在剧中,赤列多吉遇到管家时腰带得厉害,人差点匍匐到地上。白玛扎西说:“岳父说,农奴见到主人,腰要一直弯着,而且只能看主人的脚面,不能对视,要不然就会挨鞭子。”

白玛扎西的岳父就是多吉。

为把戏演好,他还挨了不少鞭子。“不用力打就不像。”老人们说,管家的语气、眼神就是要凶,下手要狠。”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说,“我们把牛皮鞭换成了羊毛鞭,藏袍下再垫上纸板,但每次还是把白玛扎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”

凝聚两代人心的《农奴泪》获得了成功。2009年至2011年,这部剧先后在山南、拉萨等地上演,观看人次累计超过3万,许多观众深受感染。在边巴次仁印象中,每次演出,总有人质疑:“旧社会真有那么苦吗?”身边的老人就会回应:“真的克松庄园比这残忍得多,农奴的血泪只适合在晚上诉说,因为那时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,多得数不清!”

“参加《农奴泪》演出改变了我的人生”

3月的雅鲁藏布江,杨柳吐绿,田野泛青。今天的克松村已改称社区,宽阔的水泥路两旁是数十间商铺、茶馆,藏式楼房错落有致,家家户户门前都停着小车。一些老人坐在门口喝甜茶,晒太阳的年轻人并不多见,都外出务工、求学去了。

正因为人少,《农